

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发展

——珞珈青年经济与管理论坛 200 期

暨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 (YES) 特别活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奇军*

“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珞珈青年经济与管理论坛 200 期暨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 (Young Economist Society, YES) 特别活动于 2015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3 日在武汉大学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是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经济评论》杂志社联合举办,并得到了《世界经济》杂志社、《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复旦大学“当代经济与社会工作室”、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早报》的大力协作。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厦门大学共 13 所高校 20 多位青年经济学者。众多青年学者共聚一堂,纷纷结合各自的研究经验,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就“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4 月 2 日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文建东教授主持了此次论坛的圆桌会议,参会者就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发展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众多学者主要就中文发表的重要性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论题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并提出各自独特的学术建议。

4 月 3 日上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谢丹阳教授出席了本次论坛的开幕式,并致欢迎辞。中山大学教授徐现祥,复旦大学教授陈钊,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杨其静,武汉大学副教授代谦等作了主题演讲。4 月 3 日下午,论坛分两个分论坛举行,共计 14 位学者在会上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并引发热烈讨论,形成了一系列旨在聚焦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发展问题的极具价值的学术观点与政策建议。

一、中文发表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

经济学研究应关怀现实,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离不开对本土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回答。

围绕“中文发表的重要性与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这一主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认为,中文发表在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方面具有英文发表不可取代的作用。以近些年来关于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问题的讨论为例,中文发表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最终使该学术讨论进入英文文献和国际学术界的视野。此事件可视为

* 李奇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

中文发表使中国经济学研究实现国际化的成功案例,归根到底,这离不开对中国本土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中国还有更多、更大的现实问题需要中国学者去面对、去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也有可能成为中文发表与中国经济学进步的源泉与起点。

复旦大学陈钊教授指出,中文发表的重要性应该体现在它对回答纳税人和决策者关心的具体政策问题时所具有的针对性和严谨性。以美国的经济学期刊为例,虽然它有相当部分文章是属于一般化的、普适性的和纯理论性的研究,但同时,它们也有大量文章是对美国具体现实问题、政策问题的分析,这些文章通过使用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方法,对涉及诸如养老保险制度、小班级政策等具体政策给出学术层面的解答与参考。中文发表在对涉及中国具体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时有必要提高其针对性和严谨性。

《世界经济》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宋志刚博士从期刊的角度对中文发表和中国经济学研究国际化提出了稍显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中文发表与英文发表的读者对象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中国学者应该主动在全球领域内争取不同的受众对象,提高其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执行主编丁开杰博士认为,不同的中文期刊具有不同的特色,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借鉴与融通,学者应该在真实世界和理论之间搭建平台,去影响现实决策。北京大学教授颜色指出,中文发表的进步需要一个具有足够厚度和足够开放的期刊市场,使从事不同研究类型和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学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表平台。

二、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中山大学徐现祥教授从政府官员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事实进行理论分析,认为政府官员对经济增长有影响、能负责,并且增长目标管理是其中关键。自 Bo(2002)与周黎安(2004)从晋升竞争视角考察官员的经济绩效开始,不少国内外学者都逐渐将官员角色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之下,众多研究分析表明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徐现祥等,2007;张军等,2007;姚洋、张牧扬,2013)。针对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呈缩小趋势,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理论对此提出了一个可能性解释。其基本逻辑是,东部地区为了在中央政府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背景下调整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策略性地降低经济增长目标,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徐现祥、梁剑雄,2014)。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增长目标的变动趋势和实际增长速度的变动趋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除了从官员角度考察中国经济发展以外,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则从土地角度分析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土地困境及其改革措施。数据显示,自1990-2006年,中国非农业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与城市土地的平均扩张速度差距明显,尤以西部地区为最,其非农业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3.4%,而建成区土地平均扩张速度为8.63%,两者相差5.23个百分点。人的城市化与地的城市化相脱节是中国土地困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一项适应人口跨地区流动趋势的改革势在必行,具体措施包括:(1)实行农业用地永佃制,鼓励土地使用权流转;(2)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借助于行政力量或者交易机制使异地占补平衡;(3)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让更多的劳动力分享经济集聚的好处;(4)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削弱地方政府对于发展经济的职能。

复旦大学陈钊教授分别从理论层面、实证层面分析了户籍身份对行业收入差距、居住区分割、教育回报的空间差异、居民之间的信任水平、居民幸福感以及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等

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城镇户籍是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重要因素;户籍分割会显著降低居民之间的信任水平;当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城市内移民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对移民的公共服务歧视也会加剧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力之间的福利差距和社会冲突。考虑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经济由分割逐渐趋向融合,并引致一系列内生制度变迁,为此,国家应该推行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同时,产业升级的成功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为此有必要发展职业教育,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同时,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市民化。

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事实进行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杨其静教授考察了中国式分权的特征、优势和弊端。首先,中国式分权的基本特征包括:(1)精英治国的“新权威主义”,即政治家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脱选民结构的制约;(2)政治集权,经济分权;(3)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和经济资源;(4)对外开放下的分权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特征。其次,中国式分权的优势在于政府始终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和管制权,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向企业提供大量廉价资源;辖区竞争使企业从政治关联中获得利益,从而使大量利用廉价资源的制造业快速发展。最后,中国式分权的弊端在于,容易放大政治关联的重要性,扭曲企业的发展战略;由于权力参与收入分配,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中国极有可能陷入到“官僚资本主义”陷阱中,形成“政治关联盛行——收入分配不公——企业能力缺乏——政治关联更加盛行……”的恶性循环。

三、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

华中科技大学范子英教授利用卫星灯光数据,考察了政治关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者使用部长级别的官员数据来克服由政治晋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在 DID 的识别策略下测度政治关联的经济增长效果。结果发现,部长对出生地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20%,而且其过去的工作地相比其出生地并不重要,反映感情重于关系,另外,部长对出生地的主要贡献渠道是对该地的投资增加。

政府行为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宏观分析视角下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山大学张莉副教授以中国 2001–2009 年地级市为样本,分析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会加剧银行信贷的错配,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而武汉大学杨勇副教授的研究则表明,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地区适宜性的公共投资政策,取得比传统的直接补贴措施更好的引资效果。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研究领域,Grossman 和 Krueger(1995)提出的 EKC 模型^①为分析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基本框架。来自厦门大学的姚昕副教授利用 EKC 分析框架,在控制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技术水平三大因素后,将腐败水平作为核心变量进行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腐败影响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其具体机制是通过影响环境治理力度实现的。而武汉大学副教授李雪松也以 EKC 为基本模型,对中国农村水环境的时空分布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中国农村水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农业生产规模的空间分布规律大致相同;(2)农村水环境污染总氮和总磷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3)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农业经济比重的增加会加剧农村水环境恶化。

^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模型是表示环境污染程度与收入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理论模型,该理论由 Grossman 和 Krueger(1995)在“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

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视角来自经济史。武汉大学代谦副教授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靖康之难”时期的宋代海外贸易,分析“靖康之乱”的外生冲击对宋朝“商业革命”的影响,并得出要素禀赋对经济发展有着根本性影响这一一般性的理论结果。“靖康之乱”(1127年)在灭亡北宋的同时,彻底改变了宋朝的要素禀赋结构,宋朝完全丧失了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一传统农耕区,土地面积大量减少,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优势发生逆转。这种逆转对宋朝经济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不依赖土地的海外贸易在宋朝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

四、经济发展的微观视角

微观层面,北京师范大学徐建炜副教授将研究视角集中在教育经济学领域,分析中国的大学扩招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溢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199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溢价是27%,而到2009年,这一比例已达到58%。作者对中国自1999年开始实行的大学扩招引起高等教育劳动力供给显著增加这一事件的研究发现,大学扩招使26~30岁阶段的年轻劳动力的高等教育溢价下降了42%。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学扩招的影响将会遍布所有年龄段的劳动力。

武汉大学赵奇伟副教授从企业层面考察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市场规模、其他地区市场规模和国外市场规模结合起来,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分析发现:(1)无论是行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本地市场规模和市场分割存在相互强化的交互效应,而其他地区市场规模和市场分割存在相互弱化的交互效应;(2)国外市场规模的效应在行业层面和在企业层面上有所不同,给定市场分割程度,依赖国外市场的企业在国外市场规模较大的省区出口竞争力较弱,而依赖国外市场的行业在市场分割较高的省区出口竞争力较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李辉文教授则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效率问题。理论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究竟是负面还是正面,取决于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较低时,社会网络会提高交易效率;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公开的市场逐步完善,则负面作用可能凸显,造成资源误置。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网络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社会网络盛行导致企业TFP显著降低,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社会网络则对企业TFP有显著正面影响。

从宗族文化传统角度,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张川川考察了各地区性别比失衡与男孩偏好的文化渊源。文章研究发现,中国人的男孩偏好根植于中国传统宗族文化,并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各地区宗族祠堂、家族族谱的流行程度同当地的男孩偏好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在宗族文化势力较强的地区,性别比失衡更严重,女性和男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更大。文章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男孩偏好根源于宗族文化传统,解决男孩偏好和性别比失衡问题有赖于传统宗族文化影响的消融。

五、学术研究、政策研究与经济学发展

本次论坛第五大主题是关于经济学研究与发展问题,分别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教授、西北大学的刘瑞明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的章元教授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相关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

聂辉华教授结合自己研究腐败的经历,主要阐述了做政策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政策研

究的意义表现为:(1)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政策,可能改善社会福利和国计民生;(2)作为一个权威型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扎实的政策研究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3)对政策研究的关注,有助于学术研究更接地气。但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在研究目标、研究范式和评价体系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这方面,首先,应该去寻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选题,所谓好选题,要么重要,要么有趣;其次,学会在多种文体之间自由切换,这些多元化文体包括中英文学术论文、政策报告、媒体文章和内参等;最后,要学会将学术成果进行多种形式的转化。

刘瑞明副教授则从实证角度考察了匿名审稿制度对中国经济学的推动作用。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匿名审稿制度有利于提高期刊质量,推动经济学学术的进步。相对于样本期刊内期刊的平均值,名义匿名审稿制度使得期刊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平均引文率分别提高了44.17%、87.55%、105.41%,而采取事实匿名审稿的期刊在这三方面的提高程度更大,分别提高了69.28%、154.12%、90.47%。进一步推动匿名审稿制度的普及,是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不断进步的重要保证。

章元教授以中国SO₂排放数据为例研究了中国统计数据的可靠性问题。中国统计数据的质量历来受到各方质疑,研究中国的统计数据是否存在造假、造假动机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认为,如果外生冲击影响了真实的煤炭消耗数据,那么它必然传导到SO₂数据上;而如果煤炭消耗对SO₂数据没有因果效应,则可以推断SO₂数据可能存在造假。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中国的SO₂数据和煤炭消耗量数据高度正相关,而且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因而中国的SO₂数据的质量还是基本可靠的;但分区域看,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SO₂数据造假嫌疑,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造假嫌疑较低,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的干部有更强的晋升激励,更看重增长的数量,因此,有一定的积极性对SO₂数据进行造假。

六、总结

在本次论坛上,各专家学者分别从宏微观角度、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以及经济学学术进步等方面进行了学术讨论,结合各自的研究经验,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就“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堪称一次精彩的思想交锋和学术盛宴,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建议。相信在众多青年经济学者的共同努力、交流和鞭策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面貌!

参考文献:

- 1.徐现祥、梁剑雄,2014:《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性调整》,《经济研究》第1期,第27-40页。
- 2.徐现祥、王贤彬、舒元,2007:《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数据》,《经济研究》第9期,第18-31页。
- 3.姚洋、张牧扬,2013:《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第1期,第137-150页。
- 4.张军、高远、傅勇、张弘,2007:《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第3期,第4-19页。
- 5.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6期,第33-40页。
- 6.Grossman, G.M., and A.B.Krueger.1995.“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2): 353-377.

(责任编辑:陈永清)